

《同文汇集》整理研究拾遗

李雄飞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摘要: 阿敦编著, 刘顺、桑格编辑《同文汇集》为清代私人先于官府编纂的满汉对照分类词典, 以“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广汇全书”之名见于近百年书目, 专题研究仅见于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吴雪娟《〈同文广汇全书〉满语俗语研究》。其初刻本确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寄畅斋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重刻本”为证。

关键词 《同文汇集》; 《同文广汇全书》; 满文辞书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3)02-0031-09

《同文汇集》又名《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广汇全书》, 是一部成书于康熙中期、私人编纂的满汉对照分类词典, 常被专门书目、综合书目归入“词典类”。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3个版(印)本的5部《同文汇集》4部归入“类书类”, 仅1部归入“词典类”。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简称《满蒙文词典研究》)一书对《同文汇集》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却采用了“同文广类全书”“同文广汇”“广汇全书”3个题名,^{[1]205 207 208} 吴雪娟《〈同文广汇全书〉满语俗语研究》(《满语俗语研究》)一文对其“卷二·俗语类”进行了深入研究, 著录信息却不规范。^[2] 溯及近百年的满文文献书目、提要, 各方整理著录成果也存在疏漏和讹误。特撰文梳理归纳, 订正《同文汇集》正题名、责任者、责任方式、版本、体例、收词量、文种形式、文献分类等问题, 旨在补其未尽, 发其未发, 正其讹误, 是为“拾遗”。

1. 正题名确认

关于《同文汇集》的正题名, 各家书目的著录十分混乱, 汉文正题名存在的问题较大。《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全国目录》)^{[3]116}《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北京总目》)^{[4]60-61}《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连图综录》)^{[5]65-66, 531}《吉林省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满族卷)》(《吉林总目提要》)^{[6]8}和《满文文献知见录》(《知见录》)^{[7]201-202}《俄藏满文文献总目提要》(《俄藏总目提要》)^{[8]26}均著录为“同文广汇全书”。《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满文书籍联合目录》)^{[9]25}《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世界目录》)^{[10]74}著录为“广汇全书”; 《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辽图综录》)^{[11]99}著录为“同文广类全书”。《欧洲满文文献总目提要》(《欧洲总目提要》)著录欧洲藏有3部《同文汇集》, 并按照版本分别著录了两个不同的正题名“同文汇集”^{[12]11}“同文广汇全书”^{[12]26, 7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5部《同文汇集》, 正题名的著录也不相同。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尚德堂刻本1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天绘阁刻本2部, 均著录为“同文汇集”;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金陵听松楼刻本2部, 著录为“广汇全书”。

收稿日期: 2023-08-30

作者简介: 李雄飞(1967-), 男, 山东招远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清史、满文文献研究。

(一) 正题名著录解析

满文正题名的著录不尽统一。《全国目录》著录为 *tung wen guwang hoi ciowan šu bithe* ,对应的汉文音译题名为“同文广汇全书”,并于满文题名右侧注明为“补译”。该目《凡例》第5条注明“如原书缺汉文或满文书名,则予以补译,并加说明。”《北京总目》著录的满文题名与之相同,拉丁字母转写的右侧标注有实心儿的五瓣花形星号。该目《编例》第四条对此星号作了说明“凡有汉文题名而无满文题名者,根据汉文题名译写满文,并在拉丁字母转写的题名上标此星号”。《吉林总目提要》同此,只是拉丁字母转写 *tung wen guwang hoi ciowan šu bithe* 中的 *hoi* 误作 *hūi* ,且无 *bithe* 一词。《欧洲总目提要》荷兰和法国藏本亦同。《满语俗语研究》一文著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满文题名为 *tung wen wei ji* ,对应的汉文音译题名为“同文汇集”。《欧洲总目提要》拉脱维亚藏本满文题名为 *tung wen hoi ji bithe* ,对应的汉文音译题名亦为“同文汇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著录的满文正题名为 *guwang xoei ciowan shu bitxe* ,对应的汉文音译题名为“广汇全书”。《辽图综录》著录的满文正题名为 *tu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 ,对应的汉文音译题名为“同文广类全书”。《知见录》著录上述4个版本,满文正题名均作 *tung wen gūwang hoi ciowan šu bithe* ,与《全国目录》《北京总目》不同的是,“广”字满文和拉丁字母转写中的 *u* 误作 *ū* 。前者满文题名未注明为补译,后者满文题名右侧均有“☆”符号,为补译。之所以有不同的汉文正题名,缘于此书不同版本或同一版本的不同位置题名不同,而著录者选取正题名的标准不一致。同样,不同的满文正题名,源出选定的汉文正题名,甚至于补译(音译)相应的满文题名,以便于相互匹配。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各版本汉文题名的情况如下:

(1) “尚德堂本”的内封面(内封)题名,以及每册书衣题签、书根题名均为“同文广汇全书”,书根题名为墨题。卷首自序《小引》、目录《目款》、卷端、卷末和版心题名均为“同文汇集”。

(2) “天绘阁本”与“尚德堂本”汉文题名的情况相同。

(3) “听松楼本”每册书衣、书根题名为“同文广汇”,均为墨题。内封面题为“同文广汇全书”。卷首自序《小引》、目录《目款》、卷端、卷末和版心题名均为“广汇全书”。

各家书目选择“同文广汇全书”作为汉文正题名者居多。这是因为“同文广汇全书”是国内现存该书所有版本都出现的题名;而且这一题名出现在“内封”之上。按照今人的认知,封面上的题名最为正式。所以 *tung wen guwang hoi ciowan šu bithe* 多为各家书目选作满文正题名。但是,这个满文题名在各版本中并未出现过,实为今人补译、与汉文正题名相匹配的题名。

面对不同的题名,我们须确认正题名。依据《古籍著录规则》(国家标准)^[13],正题名的选取应以卷端题名为第一著录信息源,即首选卷端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前人在古籍整理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相对而言,在一书的不同题名中,卷端题名最为正式。据此规则,“尚德堂本”“天绘阁本”的卷端题名为“同文汇集”,故应视“同文汇集”为正题名,“听松楼本”的卷端题名为“广汇全书”,当以“广汇全书”为正题名。当然,古籍情况错综复杂,使用规则著录时还需要具体分析。

2. 正题名选取

在《同文汇集》汉文正题名、满文正题名的具体选取问题,尤须严谨。第一,不应该从版本特征的共性上选取“同文广汇全书”作为总标目,转而忽略了版本特征上的个性。

第二,“尚德堂本”“天绘阁本”正题名选择“同文汇集”,并不是孤立地执行著录规则。该书所有版本的卷首均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刘顺所撰《同文汇集·小引》(《小引》),见有“凡七易寒暑而稿始就,名之曰‘同文汇集’”的内容。只有“听松楼本”将此句中的“同文汇集”4字改成了“广汇全书”,序末署年改成“康熙四十一年”,这明显是后期的个别改动。这直接说明,“同文汇集”一名由此书的责任者刘顺拟定,理应获得后世的认可。若仿照《全国目录》给该书所有版本取一“总标目”,“同文汇集”才是最佳选择。

第三,从4个不同的汉文题名来看,“同文汇集”“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都能鲜明地体现

出内容、用途,甚至编排体例;而“广汇全书”一名却似实用型类书的用名,从字面上丝毫看不出满汉对照分类词典的旨意。“同文汇集”为刘顺亲定的书名,源出责任者“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广汇全书”出现在醒目的书衣题签和内封上,或许带有广告色彩、牵涉书坊利益。

第四,“听松楼本”卷端、《小引》《目款》和版心、卷末等处题名,以及《小引》中的叙述,均作“广汇全书”,实为该本的版本特征。按照《古籍著录规则》以卷端题名为正题名的第一著录信息源有关规定,更应以“广汇全书”作为“听松楼本”的正题名。

第五,《全国目录》《北京总目》将满文题名均著录为 tung wen guwang hoi ciowan šu bithe,且均著录为“补译”。这两部书目《凡例》《编例》清晰注明,只有在原书没有满文题名的情况下,才会根据汉文题名补译满文题名。但实际上,国内见存的该书所有版本皆有满文题名 tu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只是“尚德堂本”“天绘阁本”和“听松楼本”内封所镌满文、汉文题名并不匹配,满文题名为 tu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对应的汉文题名应为“同文广类全书”,而不是其右侧的汉文题名“同文广汇全书”。笔者由此推断,汉文题名命取在先,满文题名为译名。或许满文译者以为“同文汇集”“广汇全书”“同文广汇全书”不能完美体现该书在编排体例上的特点——词条按类编排,所以在翻译书名时将“汇”字转换为“类”字。《辽图综录》著录的汉文正题名“同文广类全书”,显然是根据这一思路音译而成。tu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 是国内见存所有版本中出现的唯一满文题名,应被视为该书各版本的满文正题名。

第六,满汉文题名的“匹配”要讲究原则。首先,为了统一古籍目录的体例,照顾绝大多数不懂满文的读者,满文古籍编目以汉文操作。其次,满汉文正题名不是完全绝对的并列题名关系,并未要求严格“匹配”。再次,著录的基本原则,在于对著录对象中的实有信息进行“照录”,满文题名 tu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 为国内见存所有版本中出现的唯一的满文题名,无需补译满文题名,更无需“匹配”相应的汉文题名。《全国目录》《北京总目》的实际操作,以及《凡例》《编例》的相关规定,显然都是为了满汉文题名的“匹配”,违背了该书原有的满文正题名事实。

第七,编者抽选某一个题名作为正题名时,均需以“附注”“参见”“互见”等形式标注书中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不同题名,并注明不同题名出现的位置,以方便读者从多种信息途径进行检索。

二、责任者和责任方式鉴定

关于《同文汇集》责任者,各版本的卷端均题为“广宁刘顺正亭氏/鸭绿桑格豁轩氏/仝编辑”但各家书目著录的信息不尽一致。《世界目录》著录为“阿敦、刘顺、桑格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全国目录》《知见录》著录为“阿敦、刘顺、桑格编辑”,《北京总目》著录为“阿敦、刘顺等编辑”,《辽图综录》《连图综录》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同,著录为“刘顺、桑格编”,显然是据该书各版本的卷端所题。《满蒙词典研究》著录为“清阿敦著,刘顺、桑格等校”,《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国图图录》)著录为“阿敦等辑”^{[14]33-34},《俄藏总目提要》将2个版本均著录为“[清]阿敦撰,[清]桑格等辑”。^{[6]26}

1.《小引》点明责任者

在该书各版本的卷首,均载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刘顺所撰汉文《小引》。它实际上是自序,对成书经过言之甚详。

予平时详玩翻译,颁赐诸书,莫不冰释理顺。至操笔临翰,不必其畅达而确切者,实见闻之未广,而取精于国语者疎也。故自肄清业来,即思汇满汉为一帙,而才既不逮,又滥竽阁部,时亦不暇。丁卯解组,乃得同友人阿子博求而切究之,尝欲与共成一帙,以示来学。未几而阿子溘逝,人之云殁,斯文曷异。然阅其遗稿,大而天地山河,小而飞潜动植,以及宫室、衙署、彝伦、制官、人物、性情、形体、言动、疾厄、俗语、成言,一切器用、服食、文事、武备、舟车、戏玩之类,罔不条分缕晰,森然毕具,真翻译家之津梁也,何忍任其湮灭乎?!因约窈友桑子细加校讎,次其前后,间复参以己见,增缺删冗。至字句规格,要

皆考之成书,质诸大方,以求精确。凡七易寒暑,而稿始就,名之曰“同文汇集”。嗟乎,可谓难矣!夫清文为经理要务、不朽盛事。兹集之刊,非敢言著作,亦以见阿子^①采集之精,使后之学者知其用心之勤而力学好脩之一班,不与身而并没也。又欲偕斯人共习之、共知之,而脱然于瓦砾、木偶也。淹雅君子,尚有取焉。阿子讳敦,品端好古,自有传。

《小引》提及3位主要责任者。阿敦是该书的始作俑者,生平事迹不详。从刘顺《小引》的叙述来推测,阿敦是清初一位精通满汉文、饱读汉文典籍的满族学者,“品端好古,自有传”。刘顺取其遗稿,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该书初刻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7年间,会同好友精心修订。由此断定:阿敦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所以,《满蒙词典研究》关于“阿敦逝世应不晚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1]207}的推断不准确。《吉林总目提要》照抄《满蒙词典研究》结论。《满语俗语研究》一文作“作者阿敦(?—1687)”,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该文推测阿敦“当为其时某修书馆的满汉翻译”。《欧洲总目提要》作“[清]阿敦(?—1621)”,或为笔误。遗憾的是,《小引》所谓阿敦“自有传”,尚未得见。

《同文汇集》成书以传,重在刘顺,但其生平不详。卷端题“广宁刘顺正亭氏”,点明刘顺祖籍广宁(今辽宁北镇;“正亭”为刘顺的号。刘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小引》在文末署有“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菊月穀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古燕之寄畅斋”,还镌有“际飞”阳文墨印、“刘顺之印”阴文墨印。这两枚“对章”的印主应为同一人。所以,“际飞”是刘顺的字,“寄畅斋”是刘顺的书斋名。从《小引》署名,可知刘顺应为顺治、康熙时人。他还自称“滥竽阁部”,“阁部”正是明清两代内阁的别称。《小引》“丁卯(康熙二十六年)解组”之述,直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内阁所属的修书馆解散、刘顺修书的事务终止。显然,刘顺精通满汉文,在内阁中充当翻译修书的文员。

2. 福克斯错认武进士“刘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尚德堂刻本《同文汇集》,系德国汉学家福克司旧藏。该本函套上贴有横格小信笺,上有福克司铅笔、钢笔题记,记有刘顺信息。即“刘顺”(钢笔题)/“广宁通志”(铅笔题)/“进士1727(雍正5.)”(钢笔题)/“字际?②”(铅笔题)/“清史稿, Biogr. 98”。查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雍正五年(1727年)进士名录中并无刘顺的名字,^{[15]2696-2698}而《清史稿》“卷311列传98”确有《刘顺传》,内称:

刘顺,顺天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至金塔协副将。乾隆十三年,令将千五百人赴金川……经略讷亲屡奏顺奋勇。金川平,擢贵州威宁镇总兵。上以顺熟边情,移甘肃西宁镇总兵。入见,赐孔雀翎。擢安西提督。病,乞罢。卒,加太子太保,谥壮靖。^{[16]10652-10653}

对比《同文汇集》“原书”所提示的刘顺信息与《清史稿》“刘顺传”的内容,二者存在重大的差异。第一,籍贯不同。原书称刘顺为广宁人,而《清史稿》“刘顺传”载为顺天人;第二,原书中的刘顺有字有号,“刘顺传”的刘顺无字无号;第三,原书中的刘顺为文人,“刘顺传”中的刘顺是武将;第四,原书中的刘顺曾在内阁任职,“刘顺传”中的刘顺无此经历;第五,原书中的刘顺是清初人,主要经历发生在顺治康熙时期,“刘顺传”中的刘顺活动延及乾隆朝。假设“解组”时刘顺年方30岁,绝无可能再于40年后即70岁高龄考中武状元。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记载,“武”刘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由甘肃西宁镇总兵擢安西提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病免,十二月亡故。^{[17]2496-2497}按照福克司题记和以上假设,此时刘顺已届114岁。显然,这是同名同姓的2位官员。无独有偶,《连图综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听松楼本”《同文广汇全书》词条的末尾附上了刘顺、桑格的简介。

刘顺,清直隶顺天人。清雍正五年(1727年)武进士,官至安西提督。卒谥壮靖。

桑格(?—1699),清满洲正白旗人,喜塔拉氏。顺治末年,任三等侍卫,康熙六年(1667年)擢一等

① “阿子”对阿敦的敬称。

② 福克司不识《小引》末所镌阳文印“际飞”2字中的“飞”字,故示以问号。

侍卫,后授护军统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玄烨征准噶尔部噶尔丹。^{[5]8}

此“刘顺”依旧是顺天“武刘顺”。《连图综录》编者和福克司一样,犯了“张冠李戴”之误。这位“桑格”的生活年代与《同文汇集》的成书年代相符,但也是一位武将,与“窓友桑子”的身份不符。刘顺在《小引》中自称“故自肄清业来,即思汇满汉为一帙,而才既不逮,又滥竽阁部,时亦不暇。”同样是为官之身,一生戎马倥偬的“桑格”,即便是学养深厚,精通满汉文,也无暇与“解组”“窓友”“七易寒暑”编辑《同文汇集》一稿。因此,这2位满洲旗人“桑格”也是同名者。与刘顺合力编辑《同文汇集》的桑格,生平亦不详。据卷端所题“鸭绿桑格豁轩氏”,可知桑格为“鸭绿”人,“鸭绿”或指辽东。“豁轩”应该是桑格的字或号,“窓友”则说明桑格与刘顺的关系是同窗好友。《满语俗语研究》一文称“桑额(格)乃起居注馆的翻译”,不知何据。总之,《同文汇集》的3位责任者,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3. 责任者的各自责任方式

关于《同文汇集》的责任方式,各家书目著录不一,大多数著录为阿敦、刘顺、桑格三人“编”或“编辑”。刘顺《小引》清晰地标识主要责任者的职责。首先,“原著者”是阿敦。《小引》所谓“阿子采集之精”,说明阿敦完成了词汇采集工作,“罔不条分缕晰”则说明阿敦已经对所收词汇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编排工作。由此可见,该书的大致内容、整体框架和编排体例,由阿敦确立并完成。

笔者以为,阿敦对《同文汇集》所作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此。有清一代,私家编纂满文辞书之举在前,官府编纂在后,《同文汇集》确为清代私家编纂的满文辞书中较早的一部。其时,可资利用的资料过少,故以一己之力编一部满文辞书相当困难。所以,《满语俗语研究》一文推测阿敦为当时“某修书馆的满汉翻译”是有道理的。只有客观存在的便利条件,才能推动阿敦在满文辞书编纂上创新。《同文汇集》共分44类,其中40类为“汉译满”,仅卷二“助语类”“拟语类”“联语类”“俗语类”4类为“满译汉”,虽然形式上仍是词语的对译,但已经触及满语词法总结与归纳内容,无形中在责任方式上标识出“著作”成分。所以,笔者认为,阿敦的责任方式须著录为“编著”。刘顺、桑格后续工作分为4项。第一,“细加校讎”,对阿敦原稿进行校对;第二,“次其前后”即“编次”,对阿敦原稿的类序、词序进行调整;第三,“增缺删冗”,对阿敦原稿的内容进行补编和删减;第四,“至字句规格,要皆考之成书,质诸大方,以求精确”,对所收词汇进行确认,使之更加准确、规范。总体来说,刘顺、桑格承担的事务,属于编校的范畴。一般情况下,“校”不能纳入责任方式,《同文汇集》各版本卷端所题的责任方式“编辑”是准确的。

因此,《同文汇集》责任者及责任方式应著录为:(清)阿敦原编著;(清)刘顺、桑格编辑。阿敦先故,幸有同道好友刘顺、桑格助力,正式完成《同文汇集》编辑并数次刻印。

三、版本著录

1. 现有著述的疏漏

关于《同文汇集》的版本,《全国目录》著录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尚德堂刻本、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天绘阁刻本、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听松楼刻本。这3个版本最为通行,也是国内见存的版本。《世界目录》还著录了2个海外藏本:第一,“康熙四十二年本”,四册,“日本藏品”;第二,“日本东洋文库藏品”,四册。^{[10]74}前者无版本类型,后者无版本项,不知二者是否为同一版本或同一部书。《知见录》称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有关“刻本”,但未标识版刻年代和刻书者。中山大学图书馆著录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刻本,也没有著录刻书者。

《满蒙词典研究》“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金陵听松楼藏版刻本”之说,对版本描述有误,实无“藏版刻本”的说法。《满语俗语研究》一文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的阐述,未准确使用古籍术语,“寄畅斋刻本封面题有汉文书名《同文汇集》以及卷一的类目名称”应改作“每册书衣均有汉文书名《同文汇集》以及本册(卷)类目名称”“扉页题有‘寄畅斋编辑’‘康熙庚辰新镌’‘内附联珠集’‘本斋藏版’字样”中的“扉页”应改作“内封面(内封)”“书前有刘顺所撰‘《同文汇

集》小引’应改作“书前有刘顺所撰《同文汇集·小引》”“正文各卷卷首均题有‘广宁刘顺正亭氏/鸭绿桑格豁轩氏/全编(辑)’字样”中的“卷首”应改作为“卷端”。

“寄畅斋”为刘顺斋名,所以,该本实为家刻本。但检《欧洲总目提要》法国部分^{[11]70-89},并未见著录此版本,而是著录了一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天绘阁刻本;德国部分也没有著录德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本,拉脱维亚部分著录拉脱维亚大学科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世界目录》《全国目录》《北京总目》《知见录》均未能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同文汇集》的有关信息。

2. 版本见全的鉴定

实际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深藏国内见存的3个版本,“天绘阁本”“听松楼本”还各有两部。

“尚德堂本”,1函4册。内封镌有“tong wen guwang lei ciowan šu(左栏)/尚德堂藏板(中栏)/同文广汇全书(右栏)”,满汉题名与书衣题签同。卷前有《小引》,未署“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菊月穀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古燕之寄畅斋”。“古燕”即北京。刘顺“解组”后居京编辑《同文汇集》,故推测“尚德堂”为京城一书坊。《小引》末镌“际飞”阳文墨印、“刘顺之印”阴文墨印。《小引》后为该书的总目录《同文汇集·目款》。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半叶8行,板框20.4×15.2厘米。书中汉字“眩”“弦”“玄”等字均缺末笔,“丘”“弘”“历”等字和满文-ti均不讳。“天绘阁本”版本特征与“尚德堂本”相同,实为同一版本,唯印刷者和印次不同。从版印情况看,“尚德堂本”优于“天绘阁本”,应刻印在前,“天绘阁本”为后印本。诸多满文文献书目均把“尚德堂本”“天绘阁本”错误地著录为2个版本。

“听松楼本”行款、版式、内容与“尚德堂本”“天绘阁本”相同,字体也接近,属于翻刻本。不过,它与“尚德堂本”“天绘阁本”存在三处不同。第一,“听松楼本”把题名“同文汇集”统一改成“广汇全书”,尚有明显挖改痕迹。第二,卷首刘顺《小引》仅把未署内容改成“时康熙四十一年岁次壬午蒲月穀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金陵听松楼次”,其他内容完全一致。第三,“听松楼本”附刻有浙江萧山张天祁撰、刘顺译《联珠集》,“尚德堂本”“天绘阁本”则无。这与法国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相同。

“听松楼本”版刻略显粗糙,但在校刊上精于“尚德堂本”“天绘阁本”。如,“听松楼本”卷1第3叶A面第8行第2词“迅雷”,“尚德堂本”“天绘阁本”误作“迅云”;“听松楼本”卷1第4叶A面第6行首词“雪片旋绕 nimanggi kiyalmimbi”,“尚德堂本”“天绘阁本”将满文误作“imanggi kiyalmimbi”。可见,《同文汇集》版本信息被整理研究者误读、忽略或无视,直接导致版本鉴定和著录不断出现错误。

3. 初刻本认定

“尚德堂本”“天绘阁本”的版刻年依据为卷前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刘顺撰《小引》。《小引》所述“兹集之刊”,明确说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为版刻年。刻书者的依据是各自内封所镌“尚德堂藏板”“天绘阁藏板”。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初刻本的问题。

“尚德堂本”不是《同文汇集》的初刻本。首先,该本的刻书年和刻书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其次,该本的校刊逊于“听松楼本”;最后,在“尚德堂本”内封所镌的“尚德堂藏板”5字中,“尚德堂”3字明显挖改过,与“藏板”2字大小、墨色、字与字之间的间隔、字体风格均不一致;而且字体方正不符合康熙朝的版刻风格。结合刘顺《小引》所提供的线索,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刻本即刘顺自刻的家刻本——寄畅斋刻本才是《同文汇集》的初刻本。也就是说,《同文汇集》首先以家刻本行世,后来转由各书坊传刻。《满语俗语研究》一文推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即有寄畅斋刻本;从扉页上的‘康熙庚辰新镌’得知,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刻本实为重刻本”,笔者同意这一判断。

法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有可能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寄畅斋刻本的重刻本,或许刘顺此时还在世。另外,重刻本有可能在内容上有所改动。法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附刻有《联珠集》,“听松楼本”亦附刻有《联珠集》,说明“听松楼本”翻刻的底本是“寄畅斋本”。家刻本附刻自己的作品,实属正常。这也是责任者自刻之本“听松楼本”比“尚德堂本”“天绘阁本”校刊精良的根本原因。而且“听松楼本”将“同文汇集”改为“广汇全书”时,多处有挖改痕迹,直接说明

“听松楼本”有可能据“寄畅斋本”而“复刻”。另外,笔者推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寄畅斋初刻本中没有《联珠集》,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重刻时附入。

4. 印本的版本著录

“尚德堂本”“天绘阁本”校刊不精,以及“尚德堂本”内封“尚德堂”3字明显挖改痕迹、与“藏板”2字的大小、墨色、字距不一等特征,足以说明“尚德堂本”也不是《同文汇集》某版本的初印本,甚至“尚德堂本”“天绘阁本”的刻印还有可能要晚于“听松楼本”。单从“尚德堂本”“天绘阁本”版刻风格和避讳字情况来看,二者应该于康熙间刻印,具体刻印年代待考。因此,这两个印本的版本应该著录为“清康熙间刻京都尚德堂印本”“清康熙间刻京都天绘阁印本”。

《欧洲总目提要》著录拉脱维亚也藏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满汉合璧,半叶满汉文各4行。版心有汉文书题名、卷次和页码。题名页镌‘同文广汇全书’,卷端题名《广汇全书》,卷前存康熙四十一年(1702)刘顺撰《小引》,结尾处款识‘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菊月谷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古燕之寄畅斋’。扉页镌‘寄畅斋编辑’‘康熙庚辰新镌’‘内附联珠集’‘本斋藏版’。正文各卷卷首均镌‘广宁刘顺正亭氏鸭绿桑额豁轩氏全编(辑)’”。这段文字同样存有讹误,“四周双边”应改作“四周单边”,“满汉合璧”改作“满汉对照”,“页码”改作“叶码”,“卷首”改作“卷端”,“扉页”“题名页”同时改作“内封”,“半叶满汉文各4行”之说有误。笔者所见《同文汇集》各版本行款版式是一致的,皆为半叶8行,除“助语类”“拟语类”“联语类”“俗语类”4类外,每行均为汉文在上、满文在下。以《欧洲总目提要》所述,“寄畅斋本”似乎为汉文一行、满文一行、满汉相间的行款版式。另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所撰《小引》不应未署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叙于古燕之寄畅斋。

对比《满语俗语研究》《欧洲总目提要》著录的两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刻本,发现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个版本。《欧洲总目提要》还著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天绘阁刻本,称国内“国家图书馆等3家机构有藏”。对照《全国目录》,实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天绘阁刻本相吻合,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依据有待查考。《同文汇集》版本虽多,但行款版式相同,然而《欧洲总目提要》著录的3部藏本在行款版式上差别较大,文种形式也不宜著录为“满文”。

“听松楼本”将“同文汇集”字样改成“广汇全书”,把《小引》末署由“时康熙三十二年岁次癸酉菊月穀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古燕之寄畅斋”改成“时康熙四十一年岁次壬午蒲月穀旦广宁正亭刘氏叙于金陵听松楼次”。特别是《小引》末署的改动,只改了署年,而忽略了“丁卯解组……凡七易寒暑,而稿始就”的叙述,以致二者不合。《满语俗语研究》一文关于刘顺将《小引》中的《同文汇集》改为《广汇全书》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这些改动绝不是责任者刘顺所为,而是书商的行径。

四、文种形式与体例、词条认定

1. 文种形式

文种形式指一书所包含文种的表现或者组合形式。关于《同文汇集》文种形式,各家书目的著录结果有三。第一,《世界目录》《全国目录》《辽图综录》《连图综录》《北京总目》《国图图录》《吉林总目提要》《中央民族大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民大名录》)^{[18]58}均著录为“满汉合璧”。《欧洲总目提要》著录了2部,第一部为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听松楼刻本,文种形式著录为“满汉合璧”;第二部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天绘阁刻本,文种形式误为“满文”。其实,“满汉合璧”概念的界定是十分明确清晰的,学界和社会各界不应滥用。第二,《知见录》著录了4个版本,文种形式均准确地著录为“满汉对照”^{[7]201-202}。第三,《满蒙词典研究》将《同文汇集》著录为“汉满合璧对照词典或满汉合璧对照词典”^{[1]205},牵涉3个问题。首先,“满汉合璧”和“满汉对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种形式,二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形式和内容,还涉及文献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不论是“合璧”还是“对照”,“满汉合璧”“汉满合璧”与“满汉对照”“汉满对照”在清代并无明

确的区分。对清朝满洲人而言,表述汉译满、满译汉等用语时,都会把“满”字置于“汉”字之前,以示尊贵。笔者认为,即便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严格地区分“满汉合璧”“汉满合璧”与“满汉对照”“汉满对照”的意义不大。再次,《同文汇集》全书共设44类,40类采用“汉译满”体例,只有“助语类”“拟语类”“联语类”“俗语类”4类采用“满译汉”。所以,著录其文种形式和体例时,应以占主体的汉译满为主,个别现象可在附注项中加以说明。

2. 体例与收词量

《同文汇集》是一部满汉对照分类词典,全书共设4卷44类。卷1分9类:乾象类(158)、时令类(254)、坤舆类(正文作“地舆类”90)、山河类(182)、城野类(132)、宫室类(252)、衙署类(107)、彝伦类(219)、制官类(421);卷2分9类:封号类(56)、人物类(200)、性情类(214)、形体类(597)、言动类(223)、助语类(270)、拟语类(104)、联语类(158)、俗语类(43);卷3分12类:成语类(959)、祈禳类(47)、喜丧类(83)、疾厄类(180)、服饰类(331)、饮食类(275)、布帛类(75)、颜色类(43)、棉线类(28)、米谷类(99)、菜蔬类(63)、果品类(52);卷4分14类:器用类(401)、文事类(101)、武备类(351)、舟车类(99)、鞍辔类(99)、金珠类(53)、颜料类(51)、乐器类(66)、戏玩类(59)、飞禽类(171)、走兽类(370)、鱼虫类(156)、树木类(100)、花草类(109)。笔者在具体类名之后标识了词条的数量。全书共收词条8101个。《满蒙词典研究》统计为6688组,与笔者统计的数字差距较大。《吉林总目提要》完全照抄《满蒙词典研究》。《满蒙词典研究》对很多词典词条的统计数字,都是以“组”来表示。所谓“组”,应是满汉对照的一个词条。

《同文汇集》采用汉文古籍的装订方式,右侧装订。40类词条采用汉文在上、满文在下的汉译满体例,唯有“助语类”“拟语类”“联语类”“俗语类”4类采用满文在上、汉文在下的满译汉体例,提示满文词语的汉文释义。这4类“满译汉”词条以词、词组、短语、句子的形态出现,同样属于“词”。它们虽然篇幅很小,却在编排体例上最具特点、最为重要。其中,“助语类”收录的词条皆由二三个满文单词组成,表示声、音、形、状、貌、意等意义的词组或短语,末词均为 *semé*。“拟语类”所收词汇,绝大多数以 *hun*、*hūn*、*hon* 为后缀,表示形、状、貌、意等意义的单词。“联语类”所收词汇,在意义上与“助语类”“拟语类”接近,但在词的构成上却无规律。“俗语类”保留了一些满族俗语,转用汉语对其进行释义。

五、余论

刘顺《小引》高度评介阿敦辞书,“阅其遗稿,大而天地山河,小而飞潜动植,以及宫室、衙署、彝伦、制官、人物……文事、武备、舟车、戏玩之类,罔不条分缕晰,森然毕具,真翻译家之津梁也”。可见,《同文汇集》是一部供满汉对译者查阅的满汉对照词典,而不是“类书”。

我们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应从功用上对其进行分类。“类书”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文献类型。它摘录各种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按照内容分门别类地编排,以备检索,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百科全书。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资料汇编;以其功用来说,属于工具书的一种。类书本身的种类也很多,也有罗列文字训诂、词藻、典故的类型,却不是字典、词典。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类书类”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存在,它既不属经,也不属史,更不属集,只能将其归入子部。即便是在子部,它也显得很另类。

总之,《同文汇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满文辞书,不仅在内容上保留了极其珍贵的满语文语汇和满语文发展的重要语言史料,而且在类目设置和体例上,较好地汲取了汉语文类目设置的“营养”,又具有鲜明的满语言文化特色。这些带有独创性质的特点,对后世满文分类辞书的编纂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205.
- [2] 吴雪娟.《同文广汇全书》满语俗语研究[J].满语研究,2013(2).

- [3] 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4] 吴元丰.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 [5] 杨丰陌,张本义.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 [6] 毕淑梅,张学慧.吉林省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满族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
- [7] 黄润华,屈六生.满文文献知见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22.
- [8] 王敌非.俄藏满文文献总目提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9] 李德启.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M].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1933.
- [10] 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M].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
- [11] 卢秀丽,阎向东.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 [12] 王敌非.欧洲满文文献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古籍著录规则(国家标准)[S].北京:GB/T 3792.7-2009.
- [14] 黄润华.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目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 [15]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6]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8] 黄建明,马兰.中央民族大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Collation and Study on “*Tong Wen Hui Ji*”

LI Xiong-fei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076, China)

Abstract: Compiled by A Dun, edited by Liu Shun and Sanger, “*Tong Wen Hui Ji*” was a Manchu and Chinese comparative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created by private people before the government in Qing Dynasty. It was found in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name of “*Tong Wen Guang Hui Encyclopedia*”, “*Tong Wen Guang Lei Encyclopedia*” and “*Guang Hui Encyclopedia*”. The thematic research was only seen in “Research on Manchu and Mongolian Dictionaries in Qing Dynasty” by Chunhua and “A study of Manchu idioms in Tongwen Guanhui Quanshu” by Wu Xuejuan.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original copy was “*chang ji zhai be*” in the 32nd year of Kangxi (1693), which can be proofed by “eprinted copy of *chang ji zhai ben*” in the 39th year of Kangxi (1700)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Key words “*Tong Wen Hui Ji*”; “*Tong Wen Guang Hui Encyclopedia*”; Manchu dictionary; philology